

迈向中国的数字民族志^{*}

丹尼尔·米勒 著^{**}

李昕茹 译^{***}

我是一名英国人类学家,多年来一直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著有关于人与消费的书籍,包括住宅、汽车、衣服和购物。但在2000年左右,我开始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崛起感兴趣。我与社会学家斯莱特(D. Slater)共同出版了《互联网:民族志的方法》(*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Miller & Slater, 2000),这是我第一本研究互联网对特定群体影响的书籍。对我们人类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而是像特立尼达(Trinidad)这样的小岛,它属于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部分。三年前,我写的有关特立尼达岛的《脸书故事》一书已有了中文译本(Miller, 2011; 米勒, 2020)。

在这本于特立尼达岛上写的关于互联网的书中,我想表达的重点是:互联网很可能在每个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数字技术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倾向于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他们会对大学生做一些实验,表明某种算法会让人上瘾,并对该技术的影响提出某种普遍的说辞;但人类学家会争辩说,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事情可能并不适用于印度的农民或中国的工人。我很幸运,后来我得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两项为期五年的资助,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我能够支付人类学家团队研究数字技术对印度农民和中国工人的影响。该项目最成功的成果之一是《世界如何改变社交媒体》(*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 (Miller, Costa & Haynes et al., 2016),自然科学家关注社交媒体如何改变我们,但这本书名显示,我们更关注不同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及其后果。我们与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合作,

* 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我们为什么要发帖”项目、“智能手机人类学”项目和“智能老龄化”项目的团队成员所做的工作,同时感谢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欧盟新视界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的资助(资助协议号:740472)。

** 丹尼尔·米勒(D. Miller),伦敦大学学院。

*** 李昕茹,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免费出版了该书,并连同出版了其他田野地点(fieldsites)的有关研究著作,该项目的所有成果被称为“我们为什么要发帖”(Why We Post)。此系列书籍在全球范围内的下载量已超过 100 万。

对我们来说,人类学方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全球视角,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抑或中国进行研究,而在于人类学的核心是民族志方法。在这十年中,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人类学家与当地民众一起生活 15 个月以上得到的,这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至关重要。首先是因为这些技术往往是非常隐私的。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埋头使用智能手机,但如果不越过他们的肩膀看,就不知道他们在智能手机上具体做什么。我们可以询问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目的,但是,例如,在我最近研究的爱尔兰老年人群中,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只使用两三个应用程序来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最后我发现他们可能在使用 30 个不同的应用程序。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等方法对于了解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的情况确实没有什么帮助,原因是它们被强大的话语权所淹没。英国的报纸总是在谈论社交媒体会对儿童造成伤害,或者会让人上瘾,或者会造成焦虑,因为贩卖焦虑往往能使报纸畅销。因此,当你询问人们关于他们的智能手机时,他们倾向于重复那些公众话语。只有当你查看他们手机上的每一个应用程序,并询问他们最后一次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故事时,他们才会忘记这些关于智能手机是好是坏的道德争论,而详细谈论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及其后果。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想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直接观察,而不仅仅询问人们做了什么,或者如果你想花几个小时去看每一个应用程序,讨论可能涉及的非常隐私的事情,比如一个家庭内部的关系,那么就需要和田野对象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然后他们才会明白你是谁,为什么要问这些隐私的事情,并知道他们不会在你的出版物中被识别出来,而且这对于教育来说是有价值的。然而,至于我们的研究为什么需要长达 15 个月,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把民族志方法称为“整体情景化”(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在田野中,我事先并不清楚人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导致了人们对社交媒体或智能手机进行某些使用——有可能是他们的家庭生活、教育、政治、职业、宗教,他们对运气和命运的看法或他们的个性。因此,我们需要全面了解这些事情,否则无法决定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影响。民族志是唯一像真实生活的方法。我们知道,人并不仅生活在一个学术话题里,他们同时生活在我们所有

的研究主题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实时发生的情况下一起研究所有的线索。倘若我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是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我们就不能捏造假设来进行测试。我们必须以开放和机会主义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循序渐进地了解这个主题。民族志试图不做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没有任何访谈。我们只是很好地了解人们,当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工作、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或为他们做饭时,作为谈话的一部分与他们谈论这些事情。

这种民族志或整体情景化的方法不一定只由人类学家使用,它可以在社会学和媒体研究中找到,但它与人类学学科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也是我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在中国,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数字媒体的重要研究(例如 Qiu, 2009)。但我看到的问题是,中国的人类学是由对少数民族和族裔社区的研究兴趣而发展起来的,而负责研究城市中主要汉族社区的是社会学。但是,人类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对 15 个月整体情景化的承诺,以及对人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变化的认识,对于大城市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关心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学是未来的学科,而不是过去的学科。事实上,这也是我专注于数码人类学的一个原因,也表明了民族志方法在我们谈论正在人群中传播的最新技术时是特别有价值的。然而人们往往不愿意等待 15 个月的研究结果,以了解抖音算法的影响,或微信最新的小程序。但是我已经在上文提过,好的研究没有捷径。我们学者要想发表权威见解,最好以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为依据。

事实上,人类学可以成为研究的先锋。我是第一个提出脸书在年轻人中失去人气的学者(Miller, 2013)。当然,脸书公司肯定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会隐藏这一事实,因为这会对他们的股票价值不利。当我第一次提出此观点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但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已经融入了一个群体,我每天都在和年轻人交谈。我的说法不胫而走,人们逐渐意识到我是对的。经常有公司和其他人问我是否愿意做一个“简短”或“快速”的民族志,政府有时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同意这样做,因为一个糟糕的研究比没有研究更糟糕。我相信,我们总是需要整整 15 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充分的民族志研究。

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帮助创造一个现代化国家和更富有的民众的重要部分。因此,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一批当今世界最成功和最具创新性的数字公司。但我们仍然需要了解这些技术的使用及后果。对于人类学家来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因此对于云南的农民

和北京的数字公司的经理来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和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技术的“使用及其后果”也会有所不同。我不是中国人,也不会说普通话。我的兴趣首先来自认识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如若不了解中国,全球性的方法就无法发挥作用;但同时,也是因为有许多中国学生在伦敦大学学院与我共事。

人类学另一个不寻常的方面是,我们通过移情来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试图理解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因此,我们建议,学生至少在其第一次研究中,不应该与像他们一样的人合作,而是与同他们非常不同的人合作。我第一次参与数字中国的研究时就呼应了这种观点。作为 2012—2017 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帖”项目的一部分,我的团队中有两人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第一位是个英国人,叫麦克唐纳(T. McDonald),他那时已是我的博士生,在云南做实地考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他决定到山东省的一个农村小镇调研。团队的另一位成员王心远,她本身就是中国人,决定到一个工厂里进行田野调查。心远对中国 2.5 亿人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工厂系统感兴趣。虽然这是一个中国学生研究中国人的案例,但她的背景与那些工厂工人非常不同,所以仍然需要基本的共情能力作为她研究的基础。因此,这意味着两项研究都是运用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此外,王心远还翻译了第一本数字人类学教科书《数码人类学》(Miller & Horst, 201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米勒、霍斯特,2014)。

麦克唐纳和王心远的这两项研究很成功。麦克唐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社交媒体在他研究的那个小镇社区的使用情况。例如,他的研究表明,对许多人来说,使用社交媒体是他们第一次可以直接与既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的陌生人互动,他们的生活、家庭关系模式由此改变。他后来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媒体》(*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Social Networks and Moral Frameworks*) (McDonald, 2016),可从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此后,他一直在香港担任讲师,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数字货币研究的论文(McDonald, 2020)。同时,王心远认为,工厂工人经历了双重迁移,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从线下到线上。她表明,往往是第二次迁移到网上的过程更成功地将他们带入现代化中国的轨道,这也是这两次迁移背后的深刻内涵。她出版了《工业中国的社会媒体》(*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Wang, 2016)一书,也由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出版。

这十年的研究和数字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对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本质提

出了许多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关于社交媒体,我们探索了一些概念,例如:“复媒体”(polymedia),涉及不同个体使用的不同平台之间的关系;“可扩展的社会性”(scalable sociality),涉及隐私的程度和网络的大小,以及人类对话中视觉与文字、口头的结合方式。关于智能手机,我们认为它最好首先被看作我们此时此刻生活的地方,我们称之为“运输的家”(transportal home),而不仅是一个通信设备。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在与个体的亲密连接方面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之为“超拟人化”(beyond anthropomorphism),并讨论了我们称之为“永久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的后果,因为它总是与我们在一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一般性观点。

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我吸引了一批中国博士生,他们帮助我将项目扩展到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后果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同样,所有这些研究都将基于经典的人类学方法,即与人的长期接触的民族志方法。目前就职于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李昕茹(去年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的博士论文便是使用该方法进行研究的例子,她表明了同时观察媒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要性。只有当你研究了民众如何看待一个媒体节目时,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后果。如果有人制作了一个节目,试图让人们向往农村生活,但观众却认为它展示了城市生活的好处,那么这个节目就变成了后者,即使它与制作者的本意相反。但我们也需要深入了解制作该节目的构想和技术。因此,为她在湖南卫视及其网络平台芒果TV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深度的理解,如果没有对创作者和观众的双重学术研究,我们是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的。

目前,我有三位中国博士生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其中之一,李晓琳专注于研究月经追踪应用程序。这项研究再次证明了人类学方法的必要性,因为理解月经追踪应用程序意味着理解诸如人们与血液的关系,以及备孕、避孕与性行为方面的一系列私密话题。需要在长期了解这一群体并获取她们的信任之后,她们才会表达内心真正的想法。短期的研究往往只会得到非真实和非公正的结果,比如仅仅得到她们认为我们想听到的内容。第二位王海潮的研究亦是如此,她研究的内容,比如人们通过微信发展社交电子商务的过程和结果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当尝试请朋友和亲戚帮你在朋友圈卖货时,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能被视为对朋友和亲戚关系与感情的剥削。因此,我们再一次需要信任和对人的充分了解,然后才能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

第三个是郑肯的研究,她在北京互联网大厂进行田野调研,关注了数码平台的设计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设计与维护社交媒体。她研究的意义在于,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将大公司想象成以高效协作、客观管理的方式运作,这种文化想象往往来自商学院或是公司本身的自我宣传,但科技公司在实际运作中的内部摩擦,可能源于设计与开发部门之间对于用户需求不同的理解、个体对于职业成功的追求与组织整体目标之间的矛盾、性别化的分工,等等,而这些内部摩擦不仅影响了数码平台作为一个机构的有效运作,也外溢到科技公司之外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方面。因为这些内部摩擦影响了数码平台本身以何种形式被设计和维护,从而间接影响了基于这些平台来展开的社会活动与用户。

我还有博士生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例如,我们关注短视频的影响,如豆瓣和快手等平台所青睐的短视频,或如哔哩哔哩等稍长的视频。我们需要在一个社区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了解这些视频是被如何用于从广告服务到改变家庭内部的沟通,我们才能真正说知道它们的后果是什么。这项研究目前正在由向昆玉进行。我一直使用“后果”(consequences)这个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无论是我们想进行良好、准确的教育和讲座,还是我们居于制定媒体政策的位置,我们都需要对后果进行恰当的研究,而非简单地认为我们知道某件事对特定群体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最后,我还有一名学生刘纯在云南的某个藏族社区工作,因为我们也想尊重当代中国的巨大多样性,而不是一概而论,认为以大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结论适用于整个中国。

我们认识到,让我们的作品也有中文版本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最新的集体论著《全球智能手机:超越年轻人的科技》(*The Global Smartphone: Beyond A Youth Technology*),也是一项比较性研究成果,不仅有英文版本(Miller, Rabho & Awondo et al., 2021),还有中文版本,可从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米勒、拉博、阿旺多等,2021)。如果你想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下载这本书是一个好的着手点。这本书包括了王心远基于上海老年人的第二项研究成果,该研究也将同时以专著的形式出版。

目前,我们正以团队的形式讨论编写一本关于中国数字人类学的书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如果以上学者都能贡献一章,同时我们也讨论融入其他对中国境内数字发展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以中文出版,那么我们将有一个资源,让整个社会科学、社会学、媒体和传播研究、新闻学、人文地理领域学者

和政策制定者都能了解、理解这个对整个人类有巨大影响的动态领域。我们需要发展这种深入的学术研究,这将给我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权威,使我们能够在做了一定深度、厚度研究的基础上谈论这些技术,使我们学者对自己的主张更加确切和有把握。

我们没有理由局限于关注学科的界限。倘若一位学者在社会学或媒体研究领域工作,但也进行了为期15或16个月的民族志研究,那么同样有价值。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深度,而不是学者的头衔。虽然我也希望人类学研究在未来能在整个中国得到扩展,以确保这种高质量的研究在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拥有适当的地位,但同时希望在这一传统下培养出来的学者能在中国的大学系统中获得教职,这将裨益于这一发展。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抽象地提出一些主张,而是要发展出一套高质量的研究体系,让大家认识到为什么这些工作对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学术工作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研究广度,包括对公司和用户的研究,如李晓琳和李昕茹的研究;或包括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如王心远研究上海人和工厂工人的方式;也让麦克唐纳这样的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同时参与此类研究。尽管我自己没有(在中国)进行实地调研,也不会说普通话,但我希望为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数字人类学硕士课程做出贡献,因为我们有很多中国学生,我希望为中国境内的博士和博士后民族志项目尽绵薄之力。另外,在未来,我认为让中国学生以与英国人类学学生相同的方式在其他地区开展(海外)民族志工作是有价值的,例如让中国学生研究英国人及其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我们也希望将来无论学生来自哪里、在哪里进行研究,都是完全平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同合作,共同创造一套关于这些新的数字媒体的全球使用和后果的研究,这些媒体已经成为整个当代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米勒,丹尼尔·希瑟,霍斯特,2014,《数码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米勒,丹尼尔,2020,《脸书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米勒,丹尼尔、拉博、阿旺多等,2021,《全球智能手机:超越年轻人的科技》, London: UCL Press.

McDonald, T. 2016, *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 McDonald, T. 2020, “‘Social’ Money and Working – Class Subjectivities: Digital Money and Migrant Labour in Shenzhe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42.
- Miller, D. & D.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Publishers.
- Miller, D. 2011,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iller, D. 2013, “What Will We Learn from the Fall of Facebook?” <https://blogs.ucl.ac.uk/global-social-media/2013/11/24/what-will-we-learn-from-the-fall-of-facebook>.
- Miller, D. & H. Horst eds. 2012, *Digital Anthropology*, London: Berg Publishers.
- Miller, D. , A. Rabho & L. Awondo et al. 2021, *The Global Smartphone*, London: UCL Press.
- Miller, D. , E. Costa & N. Haynes et al. 2016, *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 London: UCL Press.
- Qiu, J. 2009, *Working – 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 Wang, X. 2016,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